

西汉经济政策的大辩论

——从《盐铁论》看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

曹端波, 梁宏志

(云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汉武帝为巩固皇权, 解决财政危机实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昭帝时期, 中央召开了盐铁会议,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维持派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反对派展开了论辩。其两者实质是春秋战国以来“放任”与“干预”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继续, 并对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留下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盐铁; 桑弘羊; 贤良文学; 放任; 干预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05)02-0116-05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汉朝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经济政策辩论会, 针对汉武帝时期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如盐、铁、酒的专卖、均输、平准、货币等进行大讨论, 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派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盐铁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经济政策研讨会, 是春秋战国以来“放任”与“干预”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继续, 并对后来的经济政策留下了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从当时社会背景出发来分析盐铁会议所探讨的经济政策, 以求得对历史的“理解”。

汉武帝执政后, 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以加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盐铁官营、酒榷专卖、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 既是为了解决军事需要而聚敛财富, 又为消弭分裂势力, 巩固皇权奠定了物质基础。桑弘羊明确指出其目的有二: 一是抗击匈奴, “蓄货长财, 以佐边费”。^{[1](本义)}“盐铁之利, 所以佐百姓之急, 足军旅之费, 务蓄积以备乏绝”。^{[1](非鞅)}二是巩固中央集权, “令总意盐铁, 非独为利入也, 将以建本抑末, 离朋党, 禁淫侈, 绝并兼之路也。”^{[1](复古)}

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出台其直接动因便是为了解决军事费用。西汉高祖、孝惠、高后、文景之

时, 对匈奴长期实行和亲政策。汉武帝亲政后, 一改汉初的“无为”政策, 积极拓展边疆。特别是“马邑之谋”后, 加紧了对匈奴的备战, 如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紧接着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始税商贾车船, 令出算。”^{[2](卷6武帝纪)}汉武帝开边政策物质耗费巨大, 造成了空前的财政危机。如《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 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 赋税既竭, 犹不足以奉战士”, “其费发亿计, 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3](卷30平准书)}

汉武帝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出台, 还有着更深层方面的社会原因。经过汉初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开始繁荣, “汉兴, 海内为一, 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3](卷129货殖列传)}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超出小农经济的负荷力, 造成对当时小农经济的破坏。晁错敏锐地指出: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 小者坐列贩卖, 操其奇赢, 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 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 女不蚕织, 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 亡农夫之苦, 有阡陌之得。因其富贵, 交通诸侯, 力过吏势, 以利相倾, 千里游牧, 冠盖相望, 乘坚策肥, 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 农人所以流亡者也。”^{[2](卷129货殖列传)}由于商业丰厚利润的吸引, 导致人们纷纷弃农从商,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3](卷129货殖列传)}农与商之间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 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过度

收稿日期: 2005-02-08

作者简介: 曹端波(1974—), 男, 湖南常德人, 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梁宏志(1968—), 男, 湖南衡阳人, 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繁荣，必然在资源、劳动力等诸领域与小农经济相争夺，从而破坏农业经济的基础。正如贾谊所言：“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2〕}（卷24上食货志）。

汉初采取放任政策，由于中央政策的松弛，地方势力逐渐增强，并开始挑战中央权威。如汉初允许私人铸钱，导致吴王刘濞、邓通等控制货币权，“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3〕}（卷30平准书）世家大族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3〕}（卷107）地方豪民日益骄纵，无视法纪，视自己的领地如独立王国，“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3〕}（卷30平准书）而相比之下，中央财政则日益虚弱，“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则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3〕}（卷30平准书）董仲舒曾上书指出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中央政府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才能解决危机。^{〔2〕}（卷24上食货志）

由于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扶植小农经济，势必要对农商比例进行调整，适当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为了加强皇权，消除地方势力增长，势必要收回财政权，打击富商大贾。汉武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经济措施即在此呼声下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其措施也确实达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既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又解决了财政危机。“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1〕}（轻重）加重商人赋税，进行算缗；不按实纳税者，没收其财产，进行告缗。“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3〕}（卷30平准书）又实行垄断经营，均输平准，政府参与获利最丰的商品交易，为中央财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贍大司农。”^{〔1〕}（轻重）“而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3〕}（卷30平准书）

二

汉武帝时所执行的经济统制政策，从各个方面实行高度垄断，导致民间商业的窒息。这样，政策又走向了一个反面。

尽管一系列敛财措施为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因连年战争，武帝晚期其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汉书·昭帝纪》谓：“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卷7）内部也动荡不已，“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1〕}（西域）

由此可见，汉武帝经济统制政策尽管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实行变更，同样也难以维持下去。盐铁官营，官商垄断经营，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其不便，其功相行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1〕}（水旱）铁器是当时小农经济的基础，因铁器由政府垄断，难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造人们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导致“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的状况。又因当时市场网络不健全，市场相对来说还很稀少，不像唐宋时期乡村集市那样繁荣；人们居住极为分散，导致老百姓购买铁器相当麻烦，“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1〕}（水旱）政府垄断盐铁，任意抬高价格，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导致当时实际生产工具的退化。实施对私商的打击，人们致富的积极性消退，“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3〕}（卷30平准书），造成商业萎缩。政府经营失利，便将亏损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1〕}（水旱）均输官往往逼迫农民交纳不能生产的东西，“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平准官则“行奸卖平，农民重苦……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1〕}（本议）因积极支持汉武帝政策而获官的大商人卜式也认为盐铁官营带来的许多弊端，“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卖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3〕}（卷30平准书）

汉武帝加强中央财政的措施，打击了富商大贾等地方势力，但在另一层面，由于官吏亲自参与商业，“坐市列肆，贩物求利”^{〔3〕}（卷30平准书），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得利集团，这批集官、商于一体的得利集团因其垄断性而崛起，权力与经济相结合，促使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1〕}（地广），“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3〕}（轻重）盐铁官营本欲抑制地方豪富对小农的兼并，缩小两极分化，但其结果反而是官吏利用手中权力经商致富，导致社会分化更加严重。董仲舒认为官吏经商是小农破产最主要的根源，“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

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以大穷。富者奢侈羨溢，贫者穷急愁苦。”^{〔2〕}（卷26重仲舒传）政府只有改弦更张，“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卷24上食货志）才能保护小农经济。

汉武帝敛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确实解决了当时的财政问题，但这只是杀鸡取卵的办法而已，到后来为解决军费问题，也是一如旧法，向老百姓征收人头税。汉武帝对外连年战争，其沉重的徭役便落在一般老百姓身上。许多老百姓因无法承担其繁重的苛捐杂税，只好投靠“势家”或流亡。这正如贤良文学所说：“今小吏禄薄，郡国徭役远至三辅，粟米贵，不足相贍，常居则僵于衣食，有故则卖粥业。非徒是也，徭使相遣，官庭摄追，小计权吏，行施乞贷，长吏侵渔。上府下求之县，县求之乡，乡安取之哉？”^{〔1〕}（疾贫）

由此可见，汉武帝敛财措施“民不益赋而天下饶”^{〔5〕}（卷30平准书），“赋敛不增而用足”^{〔1〕}（轻重）只是一时现象。“损有余，补不足”的现实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1〕}（轻重）。许多豪富往往勾结官吏设法免除种种徭役，将其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如《史记·平准书》记载：“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3〕}（卷30）。这样，沉重的赋役迫使一般老百姓铤而走险，社会日益动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2〕}（卷66车千秋传）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派与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派展开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经济思想的大辩论：“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勿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桑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2〕}（卷66车千秋传）

三

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始源于齐国管子的专山海政策。但直至汉武帝以前，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实行的时间较短，且又局限于某些特定地区，政府对山泽之利一般是任私人自由经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统制经济措施，官府亲自充当大商人，在各方面完全扼制了私商的发展，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局面。可以说桑弘羊是春秋战国以来“轻重论”的集大成者。

过去许多学者认为专卖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政府长期实行的一种抑商政策。其实，专卖制度产生于“重商”理论，它实质是政府充当商人的角色，加入到商品交易中来。只是因为官商的垄断性，必然会抑制民间私商的发展。汉武帝

的专卖政策便是提拔大批有才能的商人来执行。《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一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3〕}当时许多地方官都是商人出身，“……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3〕}也正是由于汉武帝利用商人进行经济改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抑制私商的效果也极为显著。李埏先生认为，汉武帝胜利的契机在于用商贾去打击商贾，“商人最懂得商人的窃要，用商人去打击商人自然能中其要害，置之于死地。汉武帝的手段是最巧妙、最成功的”^{〔4〕}。

桑弘羊经济理论一个重要来源是“重商”。他在与贤良文学的论战中即明确提出商业的重要性：“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匱。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1〕}（本义）认为农工商只是社会的一种分工，工商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作用，“《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1〕}（本义）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1〕}（力耕）桑弘羊认为只有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商业是致富之源，“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者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1〕}（通有）桑弘羊本人也毫不以经商致富为耻，以自己的事例证明商业的重要性：“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鞶鞶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失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方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1〕}（贫富）

桑弘羊另一个经济理论来源是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轻重论，认为国家只有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才能巩固“大一统”的中央皇权。桑弘羊认为民间私自铸币，必导致地方势力控制商品交易大权，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局面。“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

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1](铸币)}垄断盐铁、酒的市场,从而扼杀了私商的发展,中央经济控制力得以加强。“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余,调其不足,禁溢羨,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1](铸币)}正如桑弘羊自己所指出的“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1](力耕)},一语道破其经济措施的根本用意所在。盐铁官营的重要作用即在于“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

四

贤良文学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是“善因论”。贤良文学来自民间,目睹了汉武帝“有为”经济政策对当时生产造成的破坏,认为只有实行放任“无为”的自由经济政策,才能使经济得到健康发展。“方今人主,毅之教令,张而不施。食禄多非其人,以妨农,商工市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1](相利)}

贤良文学在与桑弘羊的论辩中,借用了儒家“民本”思想。如贤良文学为了让政府放弃垄断商业,将精力转移到农业上来,在一开始便把重农与先秦儒家的贵义贱利结合起来:“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侈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1](本义)}在重农观念指导下,抨击了政府垄断商业的行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贫鄙之化。”^{[1](本义)}继承孟子“井田制”思想,主张扶植小农经济。“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欲……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1](园池)}“故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1](本义)}反对奢靡,主张节俭,要求统治者珍惜民力。“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盗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1](力耕)}“只有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1](通有)}人们才能安于生产,国家才能富强。统治者对老百姓要“仁”。为解决民间疾苦,主张政府放宽对人们的剥削,藏富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是以王者不蓄聚,下藏于民,远淫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虐。工商之事,政治之任,何奸之能成?”^{[1](禁耕)}

贤良文学来自民间,“发于畎亩,出于穷巷”,^{[1](忧边)}“皆贫羸,衣冠不完”^{[1](地广)},与下层老百姓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贤良文学打着儒

家“民本”的旗帜,要求统治者减轻人们负担,这反映了当时下层社会的要求和愿望。

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把矛头直指官僚豪富集团,鲜明地批驳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河,自莒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子贡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势位求之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弃其位,不为权利以弃其私也。”^{[1](贫富)}认为商贾之利不可“以势位求之”。在当时小农纷纷破产,社会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贤良文学举起重农的大旗,认为农业是商业的基础,只有强耕强织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真正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在于教化,而不是与民争利。“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而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1](本义)}政府官员应是为大众谋利益之团体,如处处以谋私利为根本原则,无视老百姓之福利,则危害更深。“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1](本义)}当时卜式也清醒也看到了官吏经商带来的弊端,认为“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3](卷30平准书)}

贤良文学打着重农的旗帜,但并不能因此断定其主张抑商。其实,贤良文学并非一律排斥商业,而只是认为应适当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而已。在重农这个根本前提下,工商业自有其重要作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1](本义)}。贤良文学的所谓“抑商”是抑制官商,至于民间工商业,贤良文学认为应由其自由发展,“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1](相利)}。认为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政府只有任其自由发展,才能互相满足需求。“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田,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1](水旱)}政府的专卖政策是“与民争利”^{[1](本义)}、“与商贾争市利”^{[1](园池)},只有罢除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才能使民间商品经济得到自由发展,“罢利官,一归之于民”^{[1](能言)}。

先秦时代已存在着所谓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在盐铁会议上,这两种经济观点才出现正面的斗争^{[10](P108)}。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就开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因之”,其他“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都是不可取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卷129货殖列传)}司马迁主张“顺应自然”,认为西汉初正是由于采取“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才导致经济繁荣。“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3](卷129货殖列传)}正是由于汉武帝采取“与之争”这个下下策,才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卷7昭帝纪)}，“国家衰耗,城郭空

虚”^{[1](轻重)}。贤良文学继承了司马迁“法自然”的旗帜,认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1](忧边)},政府“欲安之适足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1](忧边)},只有让其顺应自然,不加干预,才能顺利进行,使四民各安其业,“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1](水旱)}。

五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的争论是我国古代两大经济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论”与自由放任的“善因论”之间的大碰撞。斗争表面上是儒法斗争,实其不然,论战双方只不过是借助儒法经典来论证自己的问题罢了。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实质分歧在于两种不同的经济管理思想。桑弘羊是春秋战国以来干预主义“轻重论”的集大成者,主张国家亲自充当大商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桑弘羊的“轻重论”通过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收归铸币权等一系列措施,扼杀了民间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官营商业占居主导地位。由于官商的垄断性、强制性代替了市场的自然调节,大小官吏“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1](制权)}而导致商业萎缩,但轻重论有利于传统国家巩固专制集权,削弱商品经济破坏因素,对打击地方分裂势力,解决财政问题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的主要经济思想。贤良文学是春秋战国以来“无为而治”的放任经济思想的继承者,主张废弃汉武帝“有为”政策,任由民间工商业的自由发展。由于当时小农经济出现瓦解,因而提出“重农”口号,“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民安也”^{[1](力耕)},“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1](本义)}。

对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评价,我们应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汉初,由于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但由于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超过了小农经济的

负荷力,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又地方豪强控制铸币权,利用其有利资源掌控巨大的财富,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局面。为了巩固中央政权,稳定小农经济,变革的呼声已提上日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有为”经济政策。在这一意义上,桑弘羊“轻重论”经济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成为了后世历代中央政府消弭地方分裂,解决财政问题的不易之良法。但由于连年对外战争,消耗巨大,中央以敛财为目标,使国家垄断经济走过了头,民间工商业日益萎缩,小农经济也面临崩溃。只有改弦更张,才能解决内外交困的局面。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是其变革的先声;霍光执政后,召开盐铁会议,即是改革作好舆论准备。贤良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放任“无为”的自由经济政策,其“重农”、“与民休息”的经济思想是后世开明政府减轻人们负担、维持社会稳定的思想源泉。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争论不是抑商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抑制官商或抑制私商的问题,是要不要实行“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的问题。桑弘羊“轻重论”者认为必须抑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以加强中央财政;贤良文学“善因论”者认为必须废弃官府垄断商业的局面,任由民间工商业自由发展,中央将精力从“敛财”转移到“重农”上来。两者的论战其实质是“善因论”与“轻重论”两大经济管理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所代表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的执行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两者的评价,我们应从具体的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桓宽. 盐铁论[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2.
- [2]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2.
- [3]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 [4]李埏. 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J]. 思想战线, 1992 (2).
- [5]冷鹏飞. 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6]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A Big Debate on the Economy Policies of Xihan Dynasty

CAO Duan-bo, LIANG Hong-zhi

(Humanity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650091, Kunming,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imperial power and control the financial crisis, Emperor Hanwudi adopted a series of economic measures such as the authority's operating salt and iron, and fixing carriage and stabilizing prices. During Emperor Zhao di,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ld a conference on salt and iron. A debate broke out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faction with SANG Hong-yang on behalf of them and the opposition faction with Xianliang-wenxue on behalf of them. This debate was essential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debate between "interfer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since Spring-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and gave deep impact on ancient China's economy policy.

Key words: salt and iron; SANG Hong-yang; Xianliangwenxue; "interference"; "non-interference"

[责任编辑:袁国友]